

陳祚龍著

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陳祚龍著

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學經叢書  
第一輯之三

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

平裝一冊定價新臺幣貳佰元正

版權

著者陳

祚

修

龍橋



發行人劉  
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郵登電門電公司  
政記話市部話臺北市  
劃撥證：三四一五二九三業字  
一局版臺市羅斯福路  
四第〇四一四一四六二九九八  
號號四樓四號

## 「集」前小記（代序）

說起來，這還是主要因為數十年來，自己對於敦煌文物，特別地具有興趣與究心，所以不免對於中華佛教文化史籍，尤其是敦煌卷冊所有的古抄佛教藝文，也得儘量加以涉獵與探討，而個人每有所得，慣於隨行把筆將其悉予記錄，累積案頭，用備查閱；但自己所作的那堆屬於這種性質之散策，為數既夥，外加叨承許多期刊、雜誌與學報負責人不棄，經常給我一大些支持和鼓勵，不斷要我去用國語漢文，根據自己所累積的這些小「玩意」，分別結撰專文，交由他們將其披露，俾便同胞學人都可用作教、研中華佛教文化史之「新」的參考資料，是故我才不揣謬陋，先後並亦勉力撰寄了一些長長短短的篇章，以報其雅命。

近者遙見國內所有教、研佛教、佛學文化的景況，竟然也是這般地興盛，五中感奮之餘，所以我才決定撥冗來將這樣的一些曾經發表之隨筆、小品，謹予彙合、選擇、修補與改正，且以各篇發表時日的先後為順序，重行理董排比，而成此「初集」，俾讓同

胞學人現在國內從事教、研有關學術問題的時候，至少都可多得一點兒「新」的參考消息。尚祈四海方家，不吝惠錫指教。

最後，我還願藉此機緣，敬向經常給我支持和鼓勵的那些期刊、雜誌與學報負責人、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人劉修橋先生，特別是就在該公司勞神費心終將此「集」印製、流通的各種技藝專家，表白由衷的領情與感謝。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記於法蘭西哀費瑞龍場之雲樓。

# 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

陳祚龍著

## 目 錄

「集」前小記（代序）	一
戴密微著法文『考究「祖堂集」源流』之譯介（有序並跋）	一一
淺評簡介「佛教給我們的啓示」	一〇
蒙元以前開封相國寺草圖	一四
中古敦煌仕女心目中的五臺山	一九
唐宋汴洛之名寺與高僧	四〇
後魏元榮坐鎮瓜州事佛之一斑	七九
釋雲辯及其詩文	九八
從山西長治縣李抱真德政碑說到山西佛教	一〇四

汴京幻異記內見寺院堂圖及引用書文名稱通檢	一一六
元魏洛鄴僧俗譯經弘法之一班	一二六
低談淺論「仁王講」之源流	一五〇
唐代山西兩大北宗禪法國師義福及普寂生平的研究資料	一六七
元代中日「禪學」文化交流之一斑	一八七
關於趙宋西蜀高僧釋道隆	一〇二
簡介李唐天然禪師的行誼與著述	一〇六
嵩嶽禪學研究資料小集	一一九
簡介李唐居遁禪師的行誼與偈頌	一四八
關於莫高窟的開鑿年代	一五八
簡介密宗大師釋一行的著述與貢獻	一六五
關於李唐龔燈大師香巖智閑的頌吟偈讚	一七九
戴密微（法文）譯註「臨濟錄」紀要	一九三
李唐僧衆請人撰述碑銘之贊錢	一九七

李唐上元長干寺的舍利	三〇〇
李唐蘇州重玄寺之石壁佛經	三一〇
關於李唐高僧釋一行的家世、生年、入道與勸化	三一〇
關於趙宋嘉祐七年的小型石刻心經	三三一
關於李唐肅代二宗時期的禪學國師慧忠之行誼及其法語	三三四
關於研究李唐三藏法師玄奘的「作爲」及其影響之敦煌古抄參考資料	三六四
關於敦煌古抄「唱衣曆」	三七五
我所知道的衛元嵩	三八〇
關於先後兩青峯和尚的行誼及其偈子	三九一
悼念安公繼武安公	三九五
劉禹錫與佛教	四〇二
關於中華「禪學」的「南宗」與「北宗」	四四七
關於鎮江甘露寺舍利塔的滄桑	四五三

# 戴密微著法文『考究「祖堂集」源流』之譯介

## (有序並跋)

### 一、序 言

頃因回憶自我隨緣結識新中國評論的主編以來，竟亦叨承他的獎激，而一再叮囑撰寄文稿，盛情既是那般可感，始特決計不揣謬昧，擬冗操觚染翰，權且謹將蜚聲國際佛學界的大匠，法國國師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Membre）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博士，原以法文結譏的『考究「祖堂集」源流』，摘譯推介如後。

### 二、譯 文

就在有關禪宗祖師生平及其語錄記述的總目中，最近我們還得加入「祖堂集」。該集乃係屬於中國五代時期的西元九五二年內，在福建的泉州問世，而泉州亦即中古意大

利與阿拉伯各國從事東遊者所慣稱的Zayton，並且該地距離臺灣海峽西岸的廈門，實不算遠。關於如此重要的佛教藝文，似乎自其問世未幾，竟在中國本部絕迹！細說起來，這無疑地必因當時的政局動盪所使然。諸位如若懷疑，尚請費神考索：自其問世以後半世紀才流傳的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第一〇七六號），雖已早經大家認為是禪學藝文的一個大集，但是其中並沒見提到「祖堂集」這樣的書名（註二六一一一）。關於那種原於西元一二四五年所鑄，合計三八六片木板的印本祖堂集（龍按：是否該集至今天壞尚存有其爲時更早的刻本，問題實際猶難予以肯定的解答），係在高麗東南部慶尙南道陝川郡海印寺中，連同其他十四種額外的經典，經人發現，而且這批經典，都會用以補足西元一二三六一二五一年間，高麗朝廷所重刊的中華大藏經。衆所週知：最古的十一世紀高麗版中華大藏經之刻板，已於西元一二三二年，由蒙古的軍隊所銷毀，隨後高宗始命分司大藏都監，加以重刻重印（註二六一一一）。事實上，約莫二十多年以前，該集原版的印本，才經京都花園大學專門教研禪學，且曾擔任海印寺住持之一位老教授送贈花園大學當局庋藏（註二六三一一一）。隨後，柳田聖山即照此印本，悉如原式，仔細仿製，而由花園大學重予刷印，分訂五冊，銷行世上。只因是項典籍出版未幾，旋經售罄無餘，該大學當局故於西元一九六〇年，復予再印發

行，而其中的一部，且承該大學有關當局不棄，特別贈送給我（龍按：戴氏自稱），用作參考。就在西元一九六五年，該集並有依據原有刻板照相影印本（只一冊，不分本），作為高麗學人們所獻給東國大學趙明基教授的「佛教史論文集」之附錄問世（註二六三——二）。不過，這種附錄一冊本的祖堂集，開頭實印有我（龍按：戴氏自稱）曾在此間結識的圖書館學家與目錄學家閔泳珪教授所用高麗文撰寫之「緒說」，同時，這種「論文集」，我（龍按：戴氏自稱）亦叨蒙東國大學有關當局不棄，遠道郵贈一部，以便參考。再說這種附錄一冊本的祖堂集，實際只是縮印本（現為每頁縮印原有刻板三面），正文字迹尚算清晰，凡屬眼力不壞者，仍屬易得一目了然。時到如今，我們可就有了早經世人所遺忘的祖堂集之兩種極佳重印本（龍按：實際人間近世見存的祖堂集，至少已有：①花園大學最初庋藏的海印寺古印本，②柳田聖山所理董的偽製五冊本，③花園大學於西元一九六〇年發行的重印本，④東國大學於西元一九六五年所印行的附錄一冊本。戴氏所謂「極佳」的重印本，殆指③、④兩種而無疑）。

如就纂製的年代立論，祖堂集當居於①智炬（西元八〇一年）的「寶林傳」暨玄偉之「聖胄集」（西元八九八——九〇〇年）（註二六三——三），與惟勁的「續寶林傳」（

西元九〇七—九一〇年）及②另屬一系，而現存的大集：「景德傳燈錄」（西元一〇〇四年）之間。不過，「寶林傳」原有十卷，今只殘存六卷，至其用以接續該書的另外兩種，雖曾談及九世紀的「祖師」，然亦不能用作頂替其所佚遺的四卷。祖堂集原有一十卷，今存二十卷，一無缺失，允稱難得！該集實為當前流傳人間的最古最全之「傳燈集」。除此以外，該集的正文，因為未經宋代文士加以修飾，故其對於唐代的俗語之保存，實際可謂既多且純（註二六四——）。不過，正因如此，我們閱讀該集，總覺難以瞭解。事實上，僅就我們現在所有對於唐代俗語的認識，根本不易瞭解該集篇章所表現的那種極端講求謾罵式與攻訐式之「通俗主義」，何況其中又特多原在第十三世紀中流行高麗，而現在無非令人睹及唯感迷惑的漢字形體。至於該集之中，原由鈔者及刻工所加入的那麼多錯字，我（龍按：戴氏自稱）還未予計較。此外，該集的「法要」，其作者，原來當然是各位祖師，本已夠稱難懂，但是，中間再經纂輯者的隨意取捨，結果無非使我們更加感覺莫「明」其妙！現在我們假如去對該集所取所引的那麼只可說是粗惡不堪之「語錄」，略行解釋，此事為難為易，一試當可洞悉。同時，這樣的「語錄」，其所佔的篇幅，實較各個祖師的本傳為多且長，即使單憑這種現象，我們也可用以懷疑

該集纂輯者，已經自行剪裁。不過，該集說來倒確如其序中所謂的，應爲一大「法要」集。自此以後，因其殊多異文與問題，我們很可據以評閱其他宋代所纂輯的「語錄」。此外，該集還有一大寶貴的價值，這種價值，乃是其中引有各式各樣的詩歌極多，想來文學家們對此必會感到興趣。如就教義的觀點來說，該集無非應屬於南宗，該宗的創建者，上推卽當是惠能，不過，對於北宗「祖師」的名字，該集也提及不少。

關於這樣新穎的禪學研究資料泉源，並亦早經中、日學者注目留神。事實上，高麗漢城所印行該集的重刊者，曾經特別引述過胡適（自從西元一九三〇年起，即爲一不折不扣的弘揚禪學研究者）於其逝世前二年（即西元一九六〇年）所寫給他的那封長信（註二六五——一）。在日本，宇井伯壽（西元一八八二——一九六三年）於西元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間所出版的禪宗史研究之最後兩冊中，並將祖堂集的某些篇章加以譯註（註二六五——二）。不過，柳田聖山在其仿製該集出版之後，最爲專注於該集內容的研究。他且先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持祖堂集探討會，與會者計有塙本善隆、入矢義高……等，隨後且有東京金澤大學的學人參與共同考究。結果，柳田乃發表兩篇論文，其一係於西元一九五三年問世，題爲祖堂集の史料價值（初篇）（註二六

五——三）；其二係於西元一九六四年問世，題爲祖堂集の本文研究（初篇），此爲他對該集卷首數頁的詳細譯（一爲直譯，一爲意譯）註（註二六五——四）。同時，他且在其第二篇研究論文中，強調：該集正文，必需善予精析其中所充滿的奇字錯體與經人臆改亂刪的殘句片語。對於這樣的字體，雖曾經他決計悉予輯錄，然而不幸在其於西元一九六四年印行的有關論文中，所得收入者，無非仍只算是一個簡單的樣目，但願這般對於究治該集極有用途的「字譜」之續編，不久的將來，可得問世！如果對於該集所有的專有名詞之「引得」，柳田旦已有其卡片草稿，並望他可將其早日付印。

祖堂集的作者，乃是隸於泉州招慶寺，而經簡稱爲「靜」、「筠」的兩位法師。西元九三三年，王延鈞建立「大閩帝國」，直至西元九四五五年，泉州仍爲此「帝國」的重要地區之一，當時該州的刺史王延彬，乃係王延鈞的族人。雖然「帝室」外戚爭權奪利，但是王氏老少，向對佛教表示崇敬，且對禪師備加愛護（註二六六——一）。西元九〇六年，王延彬卽創建招慶寺（註二六六——二），以便供養由福州行化到泉州的和尚慧稜（西元八五四——九三二年）。慧稜和尚是雪峰義存（西元八二三——九〇八年）的法嗣，而雪峰義存的祖師，可以追算到惠能的入室弟子青原行思（卒於西元七四〇年）（

註二六六——三）。就當西元九五一年，祖堂集問世的時候，招慶寺的住持是文僧（註二六六——四），號（龍按：實卽釋門習謂之法號、香號……的簡略）淨修（註二六六——五），而且他還是祖堂集序文的作者。在此以前，無疑地，文僧必會撰過一大堆四字一句，八句成首，而以印度禪宗祖師爲題的頌、讚。他這樣的頌、讚寫本之一，且經我們在敦煌寫本中發現（註二六七——一），至其所有頌、讚的大部份，實際都已混入祖堂集內載各位祖師生平記述後面所附的頌讚之中。這個敦煌寫卷（S.一六三五號），實際也是一種頌讚集，其開端鈔有終南山僧慧觀的序文。衆所週知：終南山位於長安附近。據此簽署，我們可以斷言：這種頌讚集的內容來源地區，當爲長安。不過，文僧原在祖堂集中所編於其「頌讚」之前的文字，並未經慧觀採摘。復據這個敦煌寫卷頌讚集的朱筆尾題，可知係爲道真所鈔錄。而我們曉得敦煌寫卷原由道真所鈔者，大抵是在宋初西元九六四——九八七年的這幾年。所以，我們可以說：慧觀把文僧的「頌」「讚」輯錄未幾，即經轉到敦煌。依據慧觀的序文，可能因爲文僧時遊長安，慧觀始特當面求其製「頌」述「讚」，以便輯錄專集問世。祖堂集的編纂工作，乃係文僧的兩位弟子所完成，正因如此，就在該集每一祖師生平記述之末，多出現有他們的業師文僧之詩句（

註二六七——二）。祖堂集中且有一大段關於文僧生平的記述（註二六七——三），據此記述，可知文僧在入招慶寺之前，並曾遊吳楚。吳楚係淮河下游，而屬於浙江、江西與河南交界的地區。可能就在這個時期，文僧即在該地區開始收集資料，以便纂修祖堂集。西元九四五五年，亦即該集問世之前七年，泉州爲「大閩帝國」的鄰邦南唐（西元九三三——九七五年）軍隊所佔領（與劫掠），雖然未幾隨由當地的將領所收復，但是這位將領，旋即投降南唐，直至西元九七七年，所有福建的南部，均爲那於西元九六〇年建立中國北部的宋朝所統治。所以，我們可以說：祖堂集是在南唐時期問世，而且這種說法，並可用以證實爲什麼該集本文中竟有南唐的紀年（註二六八——一）。至於祖堂集問世，即逢當地這樣複雜的變亂，故其未幾即在中國大陸絕迹，這並不是一件什麼難於瞭解的問題；何況該集問世三年後，中國中部及西部，即在極端排斥佛教的北周政權下，產生了第四次「法難」！談及該集究竟是怎樣才經傳到高麗，問題固屬尙待考究，不過，該集實際還收有某些曾在中國行化，而原係高麗和尚的生平記述。關於這些記述的作者，我們很可懷疑，本來都是高麗人（註二六八——二）。

祖堂集的本文之前，即爲文僧的序。文僧的自署是泉州招慶寺住持（龍按：戴氏曾

將該序摘要加以譯註，今悉予以省去，特此說明）。

其次即爲高麗大藏監刻釋匡雋（俊）的解說（龍按：戴氏曾將該解說的全文加以譯註，今亦予以省去，並此聲明）。

其後即爲該集二十卷中所經記述的祖師名目，計分：七佛、二七中華祖師、六中華祖師（自菩提達摩至惠能），合計四〇古代的祖師。接着乃是中華祖師的法嗣，或以一人爲第一代祖師，九人爲第四代祖師（以組成空宗），八人爲第五代祖師（以組成北宗），八人爲第六代祖師（惠能輩），其次即爲各個祖師遞相下傳的法嗣（總共四八代），合共著錄二五三人。除此二五三人之外，實際還得加入五人，此五人既不見於上列的名目，而且該集亦無其生平的記述。柳田考究該集所著錄的人數，共爲二五九人（參看：他於西元一九六四年所發表的有關論文，頁四六——四七），並云其中五人無「傳」，故與我（龍按：戴氏自稱）所得的數字，稍有出入。至於上引名目中，最初提及的四〇位祖師名表，實際與寶林傳及敦煌本壇經所有者，完全一樣。另外，整個名目中，原有「空宗」與「北宗」的標注，悉爲小字，可能係在該集重刊時，由編印者依據宗密（西元七八〇——八四一年）的分類，而隨加添附。